

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毛氏王朝」的內部演進已經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吾人應該還記得俄帝政權亦曾經過相似的演進階段，那就是在俄國大革命後十七年（一九三四年）所開始的史達林大學清除異己。迄至目前為止，兩者主要不同的地方，祇是史魔較毛匪更形殘酷野蠻而已。

然最主要的是在共產世界中，尤其在東歐方面，匪俄衝突已經激發了強烈的劇變。在莫斯科與北平兩者之間能有自由選擇、甚或逕行遵循自我路線之可能性，已在以往的東歐共產集團中徹頭徹尾地造成一種新的形勢。然恰與一般人所猜測者相反，在東歐並不是那些史達林主義者擁護毛匪的觀點，同時也不是那些修正主義者支持俄帝；反之，却是那些「史達林主義者」在聲援黑魯曉夫的反毛運動上，比起「反史達林主義者」來更加激烈而無妥協

蘇聯經濟革命批判

李永久譯

本文譯自 Wellesley 學院經濟學副教授兼哈佛大學蘇俄研究中心研究員 Marshall I Goldman 所撰 *Economic Revolu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原載本年春季 *Foreign Affairs* 季刊。（譯者識）

在共產革命五十週年紀念的前夕，俄國人正在從事於另一個經濟革命。柯錫金（Alexei Kosygin）總理業已宣佈：到一九六八年，利潤、銷售及投資報價行將代替定額完成，作為蘇聯每個廠商成績的主要標準；但他對於意識形態的純潔性，幾乎隻字未提。此外蘇聯的經理們勢必為自己所用的資本付出利息或資本稅。利潤行將以利潤共享的方式分開，而且若干企業甚至勢必付出地租稅。據俄國經濟學家褒曼（A. Birman）說，經濟改革的意義，只有一九二一年轉變新經濟政策與一九二九——三二年實施五年計劃可以相比。顯然蘇聯現在的企圖等於是揚棄過去神聖的原則。

蘇聯人為何選了這個時機作這些基本結構的變化？這不是一種魯莽的行動。呼籲改革起源於李伯曼（Eyssei Liberman）教授，時為一九六二年九月。接着是三年至四年的積極辯論與大約兩年的實際試驗。在此期間中，大多數俄國經濟學家終於承認有作一種斷然改革的必要。當其看到在七年計劃

餘地。此種現象說明了每當牽涉到權力鬥爭時，共產黨徒們便把他們的共產主義信仰置於次要地位。

最後，匪俄衝突已經阻止了共產主義在非洲落後地區中預期所能達成的進展。印尼共黨親匪份子的慘遭失敗，已經打破該國的權力平衡。吾人尙能預見到其他現存權力關係的轉變，但不必担心莫斯科方面會因共匪地位的動搖而獲利；反之亦然。匪俄衝突正將使其兩敗俱傷，並逐漸消滅了兩者獨霸的特性。

設非共匪突然發動瘋狂反常的文化大革命，致對世界均勢造成一種新的威脅，則匪俄衝突的結果實是值得吾人大為快慰的。

（一九五九——六五）期中經濟成長率大為減退之時，他們顯然震驚。大多數觀察家看出，經濟成長率的長期上升有賴於若干基本問題之解決。所需要的是改進日常的作業程序與改良長期變革的歷程。這些，需要一種更有生產力的使用國家資本與革新刺激。

一九六〇年代早期，蘇聯經濟已經變成一種很複雜的結構，而且有勒死自己的嚴重危險。中央的計劃者發現如無工廠經理的幫助，越來越難作有效的決定。不測事件太多，使莫斯科不能為這些事件作出計劃。而且中央計劃者仍然堅持瑣屑地控制日常作業。工廠經理更動數量計劃之權甚小，這些計劃通常在一年多之前擬訂。此外，往往由於一種指導錯誤的獎勵制度，使工廠經理生產完全不適當的產品。這種制度沒有反應錯誤的機構。通常關心官僚的成份多，關心工廠顧客的成份少。不錯，這些方法已經產生過去的成長，但是增加的產品却與需求無關。

過去大半由於壓力與刺激，業已獲致成長與變化。因為計劃者與經理們幾乎都總是淹沒於其日常作業問題之中，而且沒有遠大的目標，政府必須連

續發動運動，從深沉的慣例中激勵其經濟。這就是把工業遷到西伯利亞、或是強迫化學工業的成長，或是使用天然煤氣的唯一方法。但當這些運動達到其規定的目的時，蘇聯的觀察家開始指出，這些運動也涉及相當的浪費。爲了一心致力於運動的目標起見，其他一切活動勢必停止。有時必須發動第二個運動以確保平衡。

俄國人也發現了他們的資本生產率大爲減退了。由於上述的沒有效率的作業方法，資本的生產率較小。因爲把資本當作一種免稅品來處理，問題變本加厲了。沒有利息或償還。所以工廠經理們爲了他們的生產需要，會儘可能試圖囤積資本，尤以原料爲然。如此，他們可避免集中規劃所特有的運輸停頓與供應瓶頸現象。不過除了輸入的累積之外，許多工廠和商店最近已經開始發現自己產品的存量由於不適用或品質低劣而意外的堆積起來了。

一部份是所有這些因素的因果，從工廠本身的內部產生了小的革新，在優先很高的軍事與太空等計劃方面，可能有予人印象深刻的革新。不過較小的計劃不會產生立刻的革新，這種革新乃是西方工業的特色。當發生革新的時候，往往太晚與太浪費。例如俄國官員現在承認，在解決烏拉爾（Ural）四號計算機與沙波洛塞芝（Zaporozhies）汽車生產問題所需的那五年當中，由於西方生產進步，這兩種東西都成了過時之物。

俄國人所需要的是賦予他們自發的彈性與成長的某種制度。只有以這麼一種改革，他們可望改進其經濟成長率，更有效的在國外市場上競爭，改進消費品的供應，改善其清點問題。只知道何時介紹新的產品，是不夠的；也必須有種方法知道何時停止舊的產品。

有一段時間，許多經濟學家認爲計算機會解決所有的這些問題。曾經希望計劃與計算技術的進步最後會使中央能決定所有的生產、物價、投資與消費。只要把各種未知數投入，所需的答案會井井有條的出來。然而若干計算機專家很快就知道了單靠計算機是行不通的。中央決定每一件事的未知數太多了。

俄國人環顧西方國家，甚至南斯拉夫，看到市場經濟處理日常交易，效率最大，管制最小。俄國人也看到，當市場經濟與像美國那種競爭的企業制度相聯合的時候，就解決了學習與反應的問題。不管有什麼缺點，美國企業能夠「反饋」（Feedback）。在這度一種制度當中，不能作這種反應，對

於同一之團體或個人，可能導致財政上的損失。所以經理們有反應巨大動機。俄國人承認，如果他們的問題要解決，在其經濟上他們會需要同樣的反應力與彈性。

二

關於此項改革，最極端的是什麼？第一，舊的計劃與獎勵制度已經廢除。行將不再賦予工廠數量上的生產目標。第一次試驗於一九六四年五月實施。莫斯科的男裝工廠布爾希維其卡（Bolshevichka），高爾基的女裝工廠邁亞克（Maik）首先成爲不以生產數量爲評定其成就的標準。刺激更適合於消費者需求的產品，獎金的支持，視交付履行與利潤計劃而定。一九六五年元月，烏克蘭的若干重工業工廠也准予試驗。這個計劃成長迅速，一九六五年底，有四百多個消費品製造廠與三千個零售商店已經納入此一新制度。

一九六五年九月，柯錫金總理本人宣佈：此一改革行將逐漸擴展到整個經濟。他下令採用一套略爲修正的標尺，除了利潤之外，包括資本報償、利息、資本稅與租金。也更加使用了市場研究與廣告。以蘇聯的標準而言，至少這種經濟形式是非常不統統的。同樣的，一九六六年元月，蘇聯四十三個主要工廠的經理們被認爲是達到了銷售與利潤的目標及資本的報償（利潤爲資本的一種百分率）。這些經理們勢必對於其可能有的任何銀行貸款扣除百分之零點五到二的利率。行將不再將資本總額分配給他們，作爲來自業已借來的資本預算之贈品。這些資本稅平均爲企業的固定與流動資本的百分之六。利息稅與資本稅應由一種地租稅所補充，如此變化，則情況較良好之工廠與曠場，不會獲得不當的利潤。所有這些稅在能支付獎金或計算報酬率之前，必須自利潤中扣除。一九六七年元月左右，俄國所有工業的工人，幾乎有三分之一將已納入此種新的獎勵制度，其餘工廠預定於一九六八年納入。

只要有可能，經濟標準與稅捐會超前數年確定。如此，可望經理們會盡其最大努力，而在他們表現改進經營之際，不怕他們的目標會半途而廢。爲了再加以試驗，這應該使他們消除疑慮。在邏輯上說，如果他們知道爲了革新而使創造的利潤較低時，不會受到批評；且在他們解決了這些癥結之後，其增加的利潤不會被奪走，他們應該樂於冒險介紹新的方法與產品。

已經充分供應產品的企業或進貨短缺的企業，將以彼等如何實現其利潤計劃加以判斷。可望這會使彼等盡可能有效率地從事生產。產量供不應求的工廠勢必達到銷售的目標。這會保證這些產品繼續生產。然而，直到交貨支付在銀行裏業已存入賣方的帳下為止，一種銷售才會加以計算。如此，可以刺激更好的品質，因為買方在滿意於其所已接到需求的東西之後，才會付錢。

蘇聯當局更進一步致力於增加彈性，正在介紹新的供應程序。只要有可能，就授權給企業解決其本身的買賣協定，無須政府當局的干涉。結果，這等於增加使用推銷員、貿易展覽、市場研究與廣告。如果在本地倉庫之中有現成的商品存量，則經理們在其私人倉庫中囤積貨品，應該沒有多大理由。最後，認為這會使幾乎一切最高優先產品的集中分配歸於結束。

報價率與利潤或銷售將用為成就的第二標準。現在，報價率的定義，如李伯曼所示，是與資本相對的利潤。過去說報價率的時候，係指利潤是成本的一種百分率而言。

經理們有了這種新的標準，就有一種削減其資本額的強烈動機。經理們對於減少利潤與資本比率中的分母所做的任何事情，認為都會導致一種更有效的使用資本與減少存貨。但是由於減少其資本，報價率更為改進，因為利息與資本的減少可能更低，於是利潤（分子）可能更高。如果這制止了資本的浪費，那麼資本生產率可能增加，而且這種改革的一個重大目標可能已經達到。

在利息、資本稅與地租減少之後剩下的純利潤，不僅決定了利潤率，而且也決定了工廠經理可資慎重利用的金額。工廠經理有資格把純利潤的一個特別部份挪到三種基金之中——獎金、文化與住宅基金、開發基金，所有這三種基金旨在提高工廠的生產率。

因為這些基金的大小視企業的利潤而定，可望刺激工人的興趣以減低成本，使其比過去視生產數量而定的加強與紅利時的成本還要低。在新制度中，完成目標在決算可以放到基金中的金額時，仍然是一個重大的因素，不過，超額完成的獎賞較低。這與過去的方法相反。據李伯曼說，這會刺激工廠的領導人員一開始就尋求更高的目標，而不保留其努力。

經理、工程師等人員會從獎金當中得到他們所有的紅利，不過藍領工人

們也會從舊工資中得到若干償付，如此，設若工人的表現良好，可是企業由於不是工人可以控制的原因而無利潤，那麼工人得以免於受罰。紅利的大小因各種工業而不同，並因企業情況而異，不過有一種公式對於利潤的金額作了一個限制，這種利潤可以如此運用，以確保工資不比生產率之增加為速。

發展基金特別重要，旨在鼓勵工廠本身之革新與投資。可以放到這種基金裏面的利潤之分享，與企業資本之大小有關；一年的分期償還金額可以加到該基金之中，出售舊的或剩餘的資本設備所得的收入亦然。最後，蘇聯所作五分之一的全部資本投資，可能來自各種企業的開發基金。李伯曼看到這種投資的分散與直接給工人及經理的獎金之間有一種關聯，因為開發基金由於增加每種企業自籌資本的重要性，賦與經理的控制遠比過去為多。此外，在使用來自其他基金與文化及住宅基金的紅利上，也有相當的控制權。

三

蘇聯官吏當中沒有一個人以為這項改革可能是容易的。正如最近柯錫金對最高蘇維埃說，有兩個迫切的問題：拙劣的定價與官僚的反對。現在蘇聯的物價並不充分反映產品的真實價值。自從一九五五年以來，批發價格不會澈底的修正。自那時起各種商品之間的供求關係業已大變。由於生產那些物價高得不正當的產品，工廠經理可能在一種不理想的貨品上求意外的利潤。這可能很易引起再作嚴密的管制。

柯錫金也提到那些怕改革會傾覆自己地位的人，對於改革會加反對。他斷言：「某一種保守主義與缺乏主動精神，有時候表現於企圖解決與經濟改革運動有關的許多事情之中。」有關工業的各部會也會拖後腿。柯錫金宣佈：「這些部會不應該過份要求企業各種參考資料。」以至於政府的干涉限制了一個工廠辦理直接合約的能力，這消除了反饋的可能性。

當然並不祇是官僚反對此種變革。俄國的許多經理和世界上的其他經理一樣，害怕競爭的影響，而且不願放棄固定市場與穩定的生產限額相當寧靜的氣氛。最後，蘇聯有許多工人像在「白衣人」這部電影當中的工人那樣，認為增加的效率可能是說沒有工作與失業。

有了這種反對，這個改革一部或全部也許有遭受停頓的可能性。畢竟蘇

聯的經濟史充滿了巧妙實驗的斷片。有一個真正的危險存在，即此種改革緩慢的步伐可能造成這種混亂：整個計劃也許遭受懷疑。也許這種改革在整個經濟當中應該已被採用，以防止來自逐次變化的畸變。而且這也可能引起麻煩。

東歐的若干大儒學派之徒把蘇聯的窘境比作捷克交通當局所面臨着的問題。爲了緩和布拉格 (Prague) 的交通擁擠，他們建議把所有布拉格的交通像英國一樣，改到道路的左側。反映顯示，在過渡時期，汽車，像蘇聯的大部份工業一樣，仍然走老路。

若干蘇聯官吏認爲新的利率與資本稅會制止新資本的提倡。這顯示資本稅作用的一種誤解。如果所計劃的設備有足够的生產率可作資本稅的償付，則資本稅不應該妨礙投資。如其生產率不足，那麼不應該先作投資。正因爲沒有這麼一種約束，資本已在過去被浪費地消耗了。然而正如經理保留太多的投資一樣，高級官員有權力在新設備充分發揮其作業能力之前自資本稅中免除新資本。

這項改革正在製造認爲不存在的問題，令人吃驚。推行經濟指導，像利息和地租那樣，已在蘇聯國內外貿易利息之間造成了一種早發性癡呆症的分裂。蘇聯人以其新的經濟方法，已經開始重新研判其生產的可能性。他們已經發現自己不會從事於最有生產力的那種對外貿易。現在他們正在開始認識地租與利息的影響，他們發現自己已經嚴重的低估了涉及擴大其原料生產的資本與土地資源的實際成本。結果他們已經一再公開的抱怨自己用諸如石油、鐵礦與煤之類的東西津貼他們的東歐盟友。自然這震驚了東歐的人，他們久已抱怨蘇聯把原料的價格定得太高了。

俄國人可能放鬆對工廠經理的若干管制，以作爲對有效貿易運動的一部分。匈牙利與波蘭已經作過這種改革，這兩個國家的若干工廠率准直接與其相對(外國的)工廠交易。現在它們不對命令反應，而對世界市場反應。以至於俄國的工廠在世界市場上變得更有競爭性，它們也應該變爲更有效率的國內生產者。

改革的新風向似乎也已經波及到了蘇聯的外援。現在資本與利率正在變成俄國人自己的，他們已經在其與比較不大開發的國家之經濟關係當中，採取了一種更爲商業性的態度。對於經濟的彈性與俄國會得到其援助的多少報

酬，有更多的強調。有些經濟學家已經呼籲通過對於貸款更加強調，這會導致俄國與東歐對於正在開發中的國家之原料作更大的剝削。(當然剝削這個字並不用於蘇聯的自我分析，只在涉及西方國家的時候才用這個字。)顯然俄國人企圖增加貸款利息，是這種傾向之一部。一九六六年八月，他們貸款給巴西，利率爲百分之四，這比俄國傳統的利率百分之二點五高得多。

四

還有兩個大問題：這個改革會增加全盤的行政效率與刺激非常想要的生產革新嗎？無疑的對於這兩方面可能有改進，但是這會够嗎？

李伯曼與這次改革的其他提議者深信：分權是正確方向當中一個必需的步驟。他們辯駁那些憂慮使用直接合約、批發商、市場研究、廣告與利潤等於中央計劃的結束或者過度的把自然資源從重工業轉向輕工業的人。相反的，改革者堅持：從必須處理許多細節的當中把計劃者解放出來，會使計劃機構可能對更爲重大的問題集中其努力。莫斯科當局勢必不再憂慮諸如此類的事情：諾夫哥羅得 (Novgorod) 的一間工廠是否把號碼正確的螺絲釘準時送到明斯克 (Minsk) 的一間工廠去而無錯誤？於是計劃者能够專注於長期目標與重大的投資需要。必要時，可用物價調整與政府津貼保護重工業。

如此分開責任，計劃者也希望對計算設備作更有效的使用。一旦中央的計劃者從每個工廠問題的細節中解放出來，他們應該自由使用其計算機，對於長期問題計劃可以採取的解決辦法。改革者也希望每個工廠可能使用其本身的計算機，透過作業研究技術之使用，以改進其作業效率。然而俄國人勢必面臨不確實知道這次改革是否够徹底，以使冒險的經理與計算機可能共存。在美國，計算機與輸入輸出及線狀計劃成爲可能的方法，是和任何其他商務工具一樣。它們主要的功能是在對最後的決心策定者提供另外的資料。但在私人的競爭性企業當中，經理通常按照自己獨立的判斷對於這些工具的發現，決定接受或不接受。

因爲蘇聯所有的工業都是國有的，通常以不同的見解去看計算機。國家的經理必須經常對於自己的措施作一種公開的說明，有所準備。因此他們需要某人或某物提供其行動之權力。如有書面的授權去作某件事情，那麼此人

可以自由行動，因他知道他能够指揮某人或某物。在這麼一種環境之中，使用計算機是被認為特別值得想望的，因其對於經理的行動能提供辯護或授權。

但有危險，計算機提供的解決行將不被視為可能性，而被視為有拘束力的解決辦法。正因爲答案是出自與個人無關的計算機，而且正因爲答案是書面的，如果經理採取另外的行動方案，自己則必招致批評。如果看到這次改革會使蘇聯經理們足夠獨立，可能覺得自由使用計算機而不爲計算機所使用，可能有趣。如其不然，可能發現一種彈性的形式已爲另一形式所取代。

成功的使用計算機有賴於另一問題之解決。如要計算機有價值，則其處理之資料必須迅速傳給負責的決心策定者。目前還辦不到，因爲蘇聯幾乎所有的通信都是書面的。因其不能用作授權的證明，一個電話呼叫很少用以發佈命令或傳遞消息。這說明了就是最簡單的事務，所涉及的書面工作也堆積如山。如果要有效率與彈性，俄國人勢必發展一種更快與更可靠的通信制度，而且他們勢必從過度依賴官方的書面命令中把自己解放出來。

在最後的分析當中，行政效率更有甚於依賴計算機之可資利用者；也必須有訓練有素之經理。是以蘇聯人已經使用生產工程師，彼等曾經受訓從事大量生產與獲得缺少的配件。可能修正經理行政的整個概念以使兩代重要的生產專家能够變成重質的改革者嗎？正如蘇聯教育部長所承認的，這麼一種變革不能於一夜之間發生。在承認亟需培養一種新的經理時，對於哈佛大學商學院的這種經理人員的培養表示公開的羨慕。事實上，一位蘇聯的交換學生正在劍橋大學攻讀教授美國工商管理的技術。

假設經理作風可以改進，這也會刺激革新的潮流嗎？在理論上說，俄國的經理應該像美國大公司的經理同樣有效的經營和有創造力。這次改革強調銷路、利潤與報價率，與諸如杜邦（DuPont）與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等美國的大公司所用的獎勵制度差不多相同。同樣的，這些美國的公司在那種限度之內准許分散的投資，現在正會是俄國的情形。所以現在俄國的新企業像美國的相對企業一樣，應能促進許多重大的改革，並把發明從他們的實驗室移到生產場所。

然而美國的革新並不完全源於較大的公司。事實上有許多人辯論，美國

革新的許多領導不是來自較大的公司，而是來自私人的小企業。儘管大組織的研究實驗室之成長，美國大部份基本發現仍然來自小的廠商，這種廠商有時候非常成功，本身變成大公司，例如波拉洛德（Polaroid）、伊特克（Itek）或塞洛克斯（Xerox）。難於看到俄國人藉這種改革將如何會能使自己利用這種特別的革新。

只有在有私人資本之處，才可能有富於創造性的小企業家的現象。有這種理想的人必須要能從各種廣泛的財源爲自己的計劃獲得財力的支援。有了具備與時俱進的理想之發明家，還是不夠，必須能有各種廣泛的資本家去支援他們。資本的來源越多，越可能發現一位投資者能認識一種特別投資的價值。當國家控制整個社會資本的時候，資本的來源銳減。通常不會有一個以上的決策者，而且沒有控訴院。如果國家資本的管制者缺乏認識一種特別發明的眼光，不管這種發現可能是何等等的輝煌，行將不會超越理想階段。革新也需要一種冒險與損失的意願。然而國家經費的管理產生極端的保守主義，這不是促進革新所期望的一種環境。

部份地認識了與國家管制資本俱來的障礙，這次改革准許企業作某種分散的投資，希望革新者可能找出可以採取的資本支援。即使廢除政府對於資本的唯一一否決權，也許可能需要更多的東西。這次改革如要成功，必須要在俄國經理之中發出一種競爭性的火花。無論其限制爲何，西方的競爭現象在刺激尋求新的與更好的方法與產品當中担任了一個基本的角色。當俄國人正在企圖模仿這種精神的時候，他們在企業階層是否能成功地產生這種精神，還有問題。已有若干很有生氣的國營企業，例如伏克士瓦金（Volkswagen）不過這些企業以與私人企業作競爭性的共存而出名。迄今爲止，當一個國家所有的企業都爲國有的時候，很難發出創造性的火花。

這次改革雖然急進，並未預告資本主義之到臨。然如中共所會迅速指的那樣。使用利潤、利息與地租之類的市場工具，當然不是馬克斯主義的一種再肯定。其所進行者，似乎是一種毅力以改善一種國家資本形式的效率。有效的經營一種龐大而且複雜的工業體系，勢必使用某種普通技術。俄國人沒有太多的選擇；好像試圖使下降的升降梯昇高一樣。由於他們的經濟變得更爲複雜，以一種快速度向前邁進，變得越來越難。如無此次改革，他們的經濟很可能落後。有了這次改革，他們希望可能邁進——至少一步不退。